

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

赫鲁晓夫下台纪事

谢文清 杨福田

1964年10月中旬，莫斯科正值深秋时节。一场雨夹雪过后，气温骤然下降，景象萧索，寒气袭人。其时，这里发生了一桩震动世界政治舞台和舆论的事件——超级大国苏联的头号领导人赫鲁晓夫“因病辞职”了。

—

是月14日下午3时许，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接到罗马尼亚《火花报》驻莫斯科记者孟田雅诺打来的电话。这位曾任该报驻北京的记者，在莫斯科同我们素有交谊的朋友语气肯定地告诉说：赫鲁晓夫已经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未能透露出这一新闻的具体来源。

如果当政11年之久的赫鲁晓夫下野属实，无疑是个人们未曾料到的重大突发事件。分社首席记者谢文清立即召集记者丁翔起、杨福田等研究这一消息的可靠性，同时告知我驻苏大使馆领导同志。大家立即汇集到分社研讨议论。

此前，分社同志在与其他国家驻莫斯科的同行以及苏联新闻界人士的交往中，无人预测或言及赫鲁晓夫会很快下台的问题。就在半年之前，赫鲁晓夫在他70岁生日（4月17日）之际，还兴致很高地接受了为表彰他的“政绩”而授予他的苏联英雄称号和勋章。显然他自己在当时也不会想到下台的厄运正在向他逼

近。直到前不久，媒体还报道了他的行踪。9月30日他离莫斯科到苏联南方度假。生性好动的他抵达黑海之滨距索契不远的皮聪大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从10月2日至13日其日程包括：参观两家国营企业，了解蛋类和禽肉的生产情况；分别接见日本议员和巴基斯坦议员；致电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表示希望会议取得成功；向在日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发贺电；同在空间轨道飞行的3名苏联宇航员通话，祝他们成功；会见法国负责核研究问题的国务部长，等等。

诚然，根据上述迹象，是难以断定赫鲁晓夫已确实下台的。于是大家分头去红场和苏联中央机关门前观察动静。虽然未发现明显的异常态势，但却看到傍晚时分红场东侧国营百货商店墙上挂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肖像旁，有人在搬梯子干活，这是平时未曾见过的情景。由于考虑到孟田雅诺此人一贯不随便说话，这次专门给分社来电话告知此事，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分析结果，大家认为此消息比较可靠。于是在下午5时左右给总分社发电，说“据传，赫鲁晓夫已经辞职，但未得到官方证实。”

电报发出后，同志们继续讨论，就坐在分社接收塔斯社新闻稿的电传机旁吃晚饭，一边交谈，一边等待机器启动的声响。时针指到15日零点，“哒哒哒哒……”，打字键跳动了。塔斯社开始播发当天的第一条新闻：苏共中央10月14日举行的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分社同志顿时放下了心，兴奋得一夜也未睡稳觉。而红场上赫鲁晓夫的肖像当夜就被取下来了。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取代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传出后，莫斯科依然是平静的，但街头行人的面部表情大都显得严肃。一些普通的苏联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了他们的某些心态。一位出租汽车司机

说：“这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非常好的。他老了。现在他可以钓鱼了。”一位打杂女工说：“我们不会生活得好些，也不会生活得坏些。这对我们来说完全一样。这是我管不着的事。这是‘他们的’事。”一位职员模样的人说：“他已经起了他的作用了。”一位学生说：“这真快……”

二

赫鲁晓夫真的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才下台的吗？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托词”。赫鲁晓夫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年事亦不算太高。他当政期间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一年要视察 10 来个州，而且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国好几次。那么，赫鲁晓夫下台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国家新领导人大多是通过竞选，发表政纲上台，人们可据以进行分析。而在苏联，政治生活的透明度甚低，最高领导人更替，事先并无风声，新人上任，谁也很难一下子弄清其施政主张。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的政治动向、方针、路线是否会发生本质性变化，这就成了分社难以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翻阅了一些资料。从赫、勃两人以往的公开言论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政见分歧。只是赫鲁晓夫常常口若悬河，哇哩哇啦爱讲话，在隆重的大会上做报告时，竟会在兴头上脱稿讲上 10 来分钟；而勃列日涅夫则比较口紧，不多说话。引人注目的倒是，10 月 15 日和 16 日《真理报》在报头两旁的“报耳朵”上，连续发表标语口号，强调坚持赫鲁晓夫执政时召开的几次苏共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决不动摇。我们花了 3 天时间，找出三、四条根据，以分社名义做了个初步判断：“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换并不意味着政治路线的根本变化。”分社的结论性意见是“换汤不换药”并在 10 月 18 日给总社发了报。使馆领导也

基本同意分社的判断。在分社发出这份电报后的第 2 天，勃列日涅夫在红场举行的欢迎“日出号”宇航员大会上讲得很明确：“我们党第 20 次、第 21 次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没想到，20 日突然接到总社有关领导同志署名发来的一份电报，指名要谢文清立即对赫鲁晓夫下台提出分析看法。于是乎，分社几位同志又忙活了起来。大家有些纳闷：两天前就发回了电报，明确阐述了分社对此事的看法，怎么总社又要求我们提出看法？经过两天的研讨，又增加一两条根据，向总社发了复电，看法仍然是“换汤不换药”。

据我们事后了解，之所以要谢文清对赫鲁晓夫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上台提出看法，是因为当时国内有关方面正在对此事进行研究，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这时“汤要换，药也要换”，而且认为赫鲁晓夫是被我们党发表的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和我国爆炸的第一个原子弹轰下台的。这种看法与分社的判断针锋相对。但是后来知道，分社的稿件未被采用。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 11 月初以祝贺 10 月革命节（11 月 7 日）为由，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访问，希望通过与苏联新领导的直接接触摸清情况。这当然是最权威的代表团，当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周总理抵莫斯科后，首先到大使馆听汇报，谢文清代表分社出席。会议开始后，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同志建议“先听听新华社记者有何意见”。谢文清当时有些惊异，因为按常理应先由大使馆汇报，分社只宜作个补充发言，于是他说：“还是先听官方人士的汇报较好，记者和使馆的意见基本一致。”没想到，周总理同意由分社先汇报，这样谢文清就只好服从了。当开始发言时，记忆力惊人的周总理突然想起了 8 年前在波兰火车上听谢文清汇

报波兰政局的情况。他又伸出手来同谢文清握了一下手（总理进入会议室时已同大家握过手），并且说：“巧呀，又碰上了你。1956年你不是在华沙当记者吗？什么时候又到莫斯科当记者的呢？你是个老记者了吧！”谢文清告诉总理他是1963年春天被派到莫斯科来担任首席记者的。随后就开始汇报。谢文清的发言不过半个多小时。一者，政治问题也没有什么数据，都是些报刊上的言论和分析；再者，距事件发生只过去半个多月，更多的迹象也未看到。更重要的是应让出时间请使馆同志多讲话，不宜喧宾夺主。使馆参赞张德群和研究室于洪亮、王荃卿等同志都相继发言。他们对苏联形势的分析同分社大体相同，但使馆的材料比分社的更充实些。大家都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政治路线不会有本质性变化，中苏关系也不大可能改善。

总理听过汇报后，提出几个问题，使馆领导都作了较细致的回答。总理说：“新华社记者同大使馆没有看法上的分歧，你们共同研究讨论过吧？”大家顿时都笑了，对总理说：“我们讨论多次了，大家意见基本一致。”

随后，总理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和新上任的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相继会谈几次，并通过参加10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同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有多次接触。其中最突出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起事件是，11月7日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的盛大节日宴会上，苏联元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中国客人进行了严重挑衅。当时贺龙同志在总理建议下向苏联元帅们敬酒叙谈，气氛友好。而马利诺夫斯基急匆匆走到贺龙同志面前大放厥词说：“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贺龙同志听后怒斥了他，并马上回到主宾桌向总理报告。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提出严正抗议，并在当夜把这一事件电告了中央。

次日，总理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又向前去看望他的勃列

日涅夫、柯西金等追问此事，坚持要求道歉。他们说马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他们代表苏共中央正式道歉。总理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间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在中苏代表后来的会谈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又表示，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分歧。同时，在会谈中，苏共新领导人依然坚持赫鲁晓夫当年 7 月提出的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周总理指出，你们要召开的是分裂的会议，我们主张召开团结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召开，我们绝不参加，实际上你们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这样，中共中央试图缓和同苏共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

周总理公事完毕，到使馆来看望大家，同使馆和分社人员以及我国留苏学生一起摄影留念，亲切交谈，勉励大家好好工作学习。周总理始终没有对分社和使馆的汇报提出不同的意见，还特地指示使馆和记者继续密切观察苏共领导的言论和政治动向。

此后的时局发展，证明苏共的基本路线确实没有变化。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竟武装入侵我珍宝岛，真刀真枪地同中国开火了。对东欧也居然推出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70 年代末竟然又大举出兵入侵阿富汗。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世界面前。

三

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从权势的顶峰跌落下来的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其内幕不甚了解。

赫鲁晓夫被黜后，直到 80 年代的前半期，苏联报刊上见不

到他的名字。后来，一些学者、记者和有关人士开始发表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文章和回忆录。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开始解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局同“利特”出版社于1993年初联合创办档案史料杂志《历史档案》（双月刊），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辞职的会议速记记录。无疑，这为了解此事的过程和内幕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料。把一些文章、回忆录和史料综合对照起来看，下面叙述的情况当是符合实际的。

早在1964年初，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内部就有人开始秘密酝酿和策划要赫鲁晓夫下台。这一年的头9个月中，赫鲁晓夫有135天在外地视察，这为发动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提供了良机。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人是这场密谋的核心人物。在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后，罢黜赫鲁晓夫的行动付诸实施了。

10月13日上午，正在南方皮聪大度假的赫鲁晓夫接到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后者说，中央委员已到齐，马上要开会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恼火地说：“这个问题不着急，我正在度假，等过些日子再说。”但勃列日涅夫坚持要他出席，并下了最后通牒：如赫鲁晓夫不去，中央全会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

赫鲁晓夫无奈，只得同也在皮聪大度假的米高扬乘专机火速返回莫斯科。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此时，赫鲁晓夫才醒悟过来，觉察到全会将讨论的绝非农业问题。他从机场先被安排前去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会开得很激烈。赫鲁晓夫驳回对他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在座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他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要设法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将是送给中国人和毛泽东的一份厚礼。再说，他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的财富。没有必要抛弃这笔财富。”直到深夜赫鲁晓夫仍不同意“自愿”退休，只是在第2天（14日）上午继续

举行的会议上，他见反抗无用，大势已去，才在事先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关于他“辞职”的声明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勃列日涅夫致开幕词，赫鲁晓夫出席。他默默地坐着，低着头，始终一语不发。苏斯洛夫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在会上做报告。他列数赫鲁晓夫的 error 和罪过，主要有：

——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热衷于在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搞独断专行，自认为有垄断真理的权利。

——盛气凌人，态度傲慢。不仅是极端粗暴，出尔反尔，放肆任性和心胸狭窄，而且还热衷于发号施令，鲁莽行事，考虑问题先入为主，偏颇不公，易于狂怒，动辄轻蔑指责他人，过分自夸和自信。

——已患上自大狂，自命不凡，自认为一贯正确。把党和人民的成就、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成果，全部记在他个人功劳簿上，而把实际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则统统归咎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州委、区委或某些领导人员。

——经常玩弄阴谋手法，千方百计挑起主席团成员相互争吵，妨碍主席团的正常工作。总是力图摆脱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对他的监督。

——肆无忌惮地鼓动对他的吹捧，竭力搞对他的个人崇拜。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那些对他阿谀奉承之辈全力以赴做到每天不是发表他的冗长讲话，就是大量刊登他的新闻图片。

——在领导农业方面犯有严重错误。自认为是唯一懂农业的行家里手，竭力要把农业的领导权独揽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在给农业工作者的诸多指示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瞎指挥，例如，不顾一切地到处强迫种玉米，直至尝到痛苦教训的苦果之后，才允许个别地区例外，等等。

——患了热衷于搞五花八门的改组与改革之癖，瞎折腾人。譬如，对工业部门的外行于预以及无数次强制推行的工业管理的改组，使科学脱离生产，使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又如，强制按生产原则分别设立工业的和农业的州党委以及工业的和农业的州苏维埃执委会两套班子，结果造成党的、国家的、经济的机关在职能、权力和责任方面的极度交叉和混同，使它们的工作相互重叠，大大降低了苏维埃的作用。

——在解决某些国际性的问题上，有时表现出草率从事和不够严肃，摆出完全不合时宜的教师爷架势。喜欢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教训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得罪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人。

在苏斯洛夫做报告时，会场反应强烈，支持他对赫鲁晓夫的指责。最后，全会通过了解除赫鲁晓夫党内外职务的决议。

应当指出的是，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只是把赫鲁晓夫的错误归结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不妥当的方法”、“不妥当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正确”；“行为失当”；“不良品质与性格”、“可怕的毛病”，等等，却并未提到政治路线方面有什么失误。相反，苏斯洛夫特别强调，苏共 20 大、21 大、22 大所确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这条路线无论在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动摇的”。他说，赫鲁晓夫是在“实际贯彻”这些大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他还攻击中共领导人在搞“分裂主义活动”，声称“今后，我们要同他们的这一立场继续斗争下去”。

布鲁塞尔《红旗报》当时驻莫斯科的记者曾发表评论说：“受到责难的不是赫鲁晓夫先生所体现的政策路线，而是他执行这一路线的方法。”这是很有见地的。

四

在莫斯科郊区寂静的伊斯特拉河畔有一片占地不大的彼得罗沃-达利尼别墅区，赫鲁晓夫退休后被安排在这里的一幢老式房屋里居住。他每月的养老金是当时的 400 卢布，相当于苏联一个中等工厂厂长的薪金。他享受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疗和特供待遇未被取消。

他被黜后很长一段时日里的生活相当孤寂，心绪沉郁。一天只讲几句话，独自一人在花园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走来走去，后面跟着他女儿列娜的那只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第 2 年夏天，他开始偶尔在警卫人员陪同下携夫人去一趟莫斯科，或在街头散步，或参观展览，或到剧院看戏。也有些亲戚朋友到别墅去看望他。他还开始大量阅读书籍，并注意看电视，收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间或在花园和菜地干些活。从 1967 年开始，用了 4 年的时间口授了他的回忆录。

赫鲁晓夫 1971 年因心脏病死后的第 3 天，当局发布的一则简短公告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悲痛地宣告，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领个人退休金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长期重病后于 1971 年 9 月 11 日逝世，终年 78 岁。”公告发表的当天，葬礼在蒙蒙细雨中于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举行，完全是以家庭名义办理的，官方没举行任何仪式。赫鲁晓夫逝世后 1 周年那天，举行了由著名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为他刻制的新墓碑的揭幕式。除死者家属、外国记者和卫兵外，其他人不许入内。这位雕塑家的构思可谓匠心独运，引人注目：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成一个对照鲜明的框架，正中是墓主人的头像。不难看出把黑白两种颜色的石块拼在一起，是寓意着对亡者一生的评价。

谢文清，男，汉族，1922 年出生，1946 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华沙分社、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等职。

杨福田，男，汉族，1934 年出生，1956 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地拉那分社首席记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八一九”难忘的日日夜夜 ❖

盛世良

我先后三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记者，经历了中苏关系严峻、关系正常化和中俄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时期。采访时受到过冷遇、在边防检查站被盘查、特殊身份的美女对我纠缠、不请自来的“朋友”强叙友情、乘坐的客机发动机半空出故障、下 1200 米深的煤井、被热情的群众围住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各种情况都碰到过。但是，最难忘的还是 1991 年“8·19”事件的日日夜夜。

8 月 19 日，记者开车比坦克先到红场

1991 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清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唐修哲把全体记者从睡梦中叫醒，开飞行集会。新华总社从北京来长途电话告，苏联发生政变，副总统亚纳耶夫等 8 名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让戈尔巴乔夫总统靠边站。老唐迅速分配了任务，分别有人盯住电讯、电视和广播。5 分钟后，记者竺承军和我各开一辆车，到市中心要害地区观察形势。

当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还设在中国大使馆院内，地处莫斯科市区西南。我按多年来的老习惯，拐上库图佐夫大街，自西向东往市中心进发。

当时，苏联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到 90 年代初，戈尔巴乔

夫发起的“改革与公开性”已闹得天翻地覆，一发不可收拾。在苏联实行了几十年的一党制已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中心开始偏移。宪法确认苏联是多党制国家，确定了总统制，并于 1990 年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为总统，实行西方国家通行的“三权分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变为“主权共和国联盟”。当时，苏联不仅有全联盟的“大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各加盟共和国一级的“中总统”，如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有俄罗斯联邦下属的 16 个共和国的“小总统”。不仅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连面积仅 3 万多平方公里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还自我宣布成立两个共和国：加告兹共和国和德温斯特河沿岸共和国。

苏联境内民族纠纷和动乱蔓延，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等 7 个共和国发生骚乱，上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

苏共削弱，思想混乱，人心浮动。苏共党内出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三大派，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原苏共高层领导人纷纷退党，引发了全国退党、退团浪潮。

社会动荡，反共反军行动频频出现。

经济危机加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生产一连两年滑坡，市场上物资匮乏，商店里空空如也，99.6% 的商品经常脱销。卢布的黑市价仅为官价的 2%，货币实际上早已大幅度贬值。

与经济过冷相对应的是政治过热。莫斯科市中心的几个广场上示威、集会不断，民主派、传统派、自由派相互攻讦，保皇党公然亮出旗号，无政府主义者穿黑衣，打黑旗，招摇过市。分社有时一天接到五六个邀请参加群众集会的电话，记者全体出动还难以招架

新闻媒体已完全自由化，谁也不听谁，想骂谁就骂谁。发表言论最踊跃的是民主派的几位头面人物：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和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等。报上三天两头有他们的文章，群众集会主席台上少不了他们的慷慨陈词，批苏维埃制度，骂社会主义，攻击列宁，呼吁清算“独裁制度”的罪恶，连足球比赛、全国选美也少不了请他们发表演说，增姿添彩。

在这种情况下，“8·19”行动开始了，副总统亚纳耶夫、负责军工与安全的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工业企业联合会主席季齐亚科夫和农民协会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正在克里米亚黑海之滨的疗养地福罗斯一栋豪华宽敞的政府别墅里度假，以为天下太平，没想到克里姆林宫里发生了变故。

夏末的莫斯科清晨，明媚的阳光透过秀丽的白桦树，星星点点地洒在柏油路上，同“紧急状态”很不相称。我们的车没开出1公里，只见前面路边停了一列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领头的指挥车里坐着一位上校。“上校同志，您好！到莫斯科来干吗？”执行任务。”上校说完就扭头不再理我们。

按常理，连非洲或拉美小国的一个上尉都懂得，政变要悄悄地干，一旦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肯定已占领了国家首脑机关、电台、通讯社等要害部门。所以我以为当时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苏联总统府所在地）和“白宫”（俄罗斯政府和议会所在地）已被军人围住。

奇怪的是我的车前方再也见不到军车。一路上别说军人，连行人也很少见。红场到了，跟往常一样宁静，游人不多，我们问了几个人，都是外地来的，还没听广播，更不知“紧急状态”为

何物。

几分钟后，车又到“白宫”。当时“白宫”还不像现在那样戒备森严，既没有 4 米高的铁栏围绕，也没有军警检查证件。我的车一直开到正门，守门的民警都懒得看我一眼，一问三不知。

我决定到陆军总司令部楼前采访和观察动静。很失望，门口连小轿车都不到 10 辆。国防部前也很平静。

这时已经上午 10 点钟了，我们来到普希金广场。那儿是传统的群众集会和议政的场所，到这儿来的多半是关心政治的人。一出地下过街道口，就遇见一个挂勋章的退伍军人。我问：“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扣起来了，您怎么看？”“早该把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拉下台了……”话音未落，身旁一个年轻人恶声喊道：“老头儿，欢迎军政府？该揍！”老人马上溜走了。

广场上到处是人，相互打听小道消息，有的听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分头问了三四十人，无一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正巧遇到了分头出来的分社记者竺承军，他也问了近 30 人，结果同我们一样。

广场上有人传言，军车已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又赶到克里姆林宫旁同红场相接的练马厅广场。扬声器里传出叶利钦总统、鲁茨科伊副总统、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和西拉耶夫总理的联合声明。俄罗斯领导人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我们通过公用电话把情况报给正在分社值班的记者。

“轰”的一声巨响从广场南端传来，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过去，也不问是炸弹还是炮击。这时我们才看清有几十辆装甲车被市民拦在广场南口外。那声巨响是吉普车胎“放炮”。盖住装甲车车号的打字复写纸被市民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市民分头围住一辆辆军车，打听、争论、叫骂。只见一名少校咚的一声跳上装甲车顶，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没有炮弹！”

说着，拿出手枪子弹盒让围观者看：空的。

军车被市民围住，干脆关了发动机相持。

这时，广场上扬声器报告“白宫”吃紧，呼吁年轻人去保卫“白宫”。

“白宫”附近已经用街心花园的铁栏杆、长椅、水泥块、钢筋和卡车筑起了乱糟糟的路障。傍晚，我们在回分社的路上看到克里姆林宫旁、要道上和桥梁旁已停了不少坦克和装甲车。

8月20日，形势急转直下

上午，我们又驱车到市中心采访和了解动向。库图佐夫大街尽头通往“白宫”的桥头已被路障挡死。“白宫”上空飘着一只炸弹形的硕大气球，球下挂着俄罗斯联邦国旗。

路障外是7辆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奇怪，坦克上怎么插了资产阶级俄国的白蓝红三色旗？坦克炮怎么不对“白宫”而对着“白宫”外？

我们从用几辆轮胎放了气的无轨电车筑的第一道街垒缝里钻了过去。坦克手和守街垒的苏联小伙子告诉我们，这些坦克已投到俄罗斯总统麾下，加入了保卫“白宫”的队伍。

我们过桥走到“白宫”。只见四周有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战车炮口上插了鲜花。几个姑娘披着军大衣坐在坦克炮塔上，同坦克兵搂肩搭背煞是亲热。不断有外国人和小企业主给军人送“万宝路”香烟、冰淇淋和当时在莫斯科还很稀少而贵重的罐装外国啤酒。

一名中年女教员从战车上跳下来告诉我们：“昨晚10点钟，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俄罗斯总统一边，今晨6点，塔曼师有50辆战车倒戈。列别德少将的空降兵团也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列别德的大名，此后盛传他在关键时刻多次救

了叶利钦，这是其中的一次。

当时没有军官在场，我们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证实了上述情况。

太出人意料了，形势变得这么快！我们立即找公用电话，把这一最新情况传回分社。

随后我们开车到红场附近继续观察。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一打听是坎提米罗夫精锐坦克师的一部。一群中老年市民围住坦克兵上校问，会不会开枪开炮、死人流血？好几个人说，国家太乱了，第比利斯、维尔纽斯都发生了市民同军队对抗的事件，还打死好多人，现在连首都也坦克隆隆，想不到“民主和公开性”会引出这种结果！

全天中雨和小雨不断，我们的衣服早已湿透。又绕到练马厅广场，这里是全市最大的一个广场，是“民主派”最喜欢的集会场地。今天傍晚要举行全市抗议集会。

高尔基大街通练马厅广场的路口由克格勃部队的军用卡车、装甲车和军人三层墙防卫，士兵都板着脸背着自动枪。

与克格勃军人不一样的是国防军军人，他们接过市民递去的叶利钦和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声明阅读，并与市民交谈。市民同军人并无明显的对立情绪，平民随随便便地爬上坦克同军人合影。一个坦克手看到我们这两个拿了照相机的外国记者，还邀我们上坦克合影。当个别激进分子骂军人为“法西斯”时，军人不动声色，反倒是围观者斥责这些人：“走开，不许挑衅，不要侮辱我们的军人！”

我们又走到高尔基大街上的市政府前，上千人在附近冒雨探听新情况。楼里不断送出影印的波波夫发表的反紧急状态声明和已被紧急状态委员会禁止出版的“民主派”小报。